

# 关于《开宝藏》刊刻的几个问题

——写在《开宝遗珍》出版之际

◎ 方广锬

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佛经同时传入。两千多年来,佛教在中国大地传播,汲取中国文化的营养,开放出灿烂的东方文明之花。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佛教典籍与中国佛教一起经历风雨洗礼,一起发展成长,形成中国特有的佛教大藏经,成为东方文明的奇葩。

汉文大藏经是网罗历代汉译佛典并以之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结构规范组织,并具有一定外在标志的汉文佛教典籍及相关文献的丛书。大藏经虽是汉文佛教典籍,却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音韵、天文、地理、历算、医学、建筑、绘画、科技、民族、社会、中外关系等诸多领域。它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对中国文化及整个汉文化圈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也是今天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乃至东方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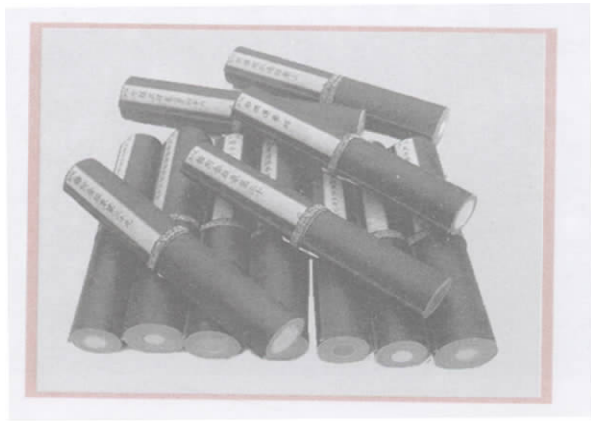
早期的大藏经均为写本,从敦煌遗书保留的部

分残卷,我们可以窥见从北魏到宋初中国写本大藏经的概貌。面对那些一丝不苟的写经,我们可以感受当年信众那份虔诚与敬信,那种情感与期望。

雕版印刷术由古代中国人发明,是中华民族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所作的又一贡献。中国的雕版印刷最早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尚在研究。根据现有的资料推断,唐代早期,雕版印刷术已经出现。现知年款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出于敦煌藏经洞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现保存在英国图书馆。该经线条洗练,刀法纯熟,附有精美扉画,学术界公认它属于成熟期的木刻印刷品。根据有关史料记载,五代时,已经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刻印儒家的五经。所以,北宋初年,版刻大藏经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开宝藏》终于横空出世。

《开宝藏》当其雕印之时,并无专门的名称。时人称之为“大藏经”、“藏经”、“佛经一藏”、“释典一藏”等。所谓“开宝藏”,乃因其开雕时间在北宋开宝年间,由近代研究者命名。亦有研究者因其开雕地点在益州(今四川成都),又称之为“蜀版大藏经”。

《开宝藏》属北宋官版大藏经,它的雕版,前期的经版保管、藏经印刷,均由朝廷派员负责。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雕版印刷的大藏经,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木刻大丛书,对后代中外大藏经影响深远。



遗憾的是,世事流变,沧海桑田,这部里程碑式的典籍最终亡佚无存。近年来,我与李际宁先生经过多方寻觅,得到诸多人士的支持,终于从中国、日本、美国等8个收藏单位找到《开宝藏》零本12卷,汇编为《开宝遗珍》,原样影印出版。吉光片羽,良足珍贵。其它各种有关《开宝藏》存本的传言,或确定为误传,或目前尚无法确定。

### 《开宝藏》开雕时间

宋初诸帝,于佛教较为崇信。据说宋太祖在行军宿营时,还阅读《金刚经》。乾德四年(966),秦凉道路甫通,宋太祖便派遣沙门行勤等157人西行求法。皇室对佛教的这种热情,是宋初雕印中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开宝藏》的重要背景。

关于《开宝藏》的开雕时间,传统有开宝四年(971)、开宝五年(972)两种说法。分别出于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三、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八等一些著作。

山西省高平市文博馆保存之《妙法莲华经》卷七,卷尾有“大宋开宝四年辛未岁奉敕雕造”之刊版题记,说明该《妙法莲华经》雕印于开宝四年,与南宋《佛祖统纪》的记载完全吻合。

不过,凡属大藏经本,其基本特征是应该系有千字文帙号,而高平文博馆的开宝四年《妙法莲华经》卷七却无千字文帙号。如果说它并非《开宝藏》本,它又有明确说明其《开宝藏》身份的刻版题记:“大宋开宝四年辛未岁奉敕雕造。”它的版式也与《开宝藏》完全一致。因此,这卷《妙法莲华经》无疑属于《开宝藏》。既然属于《开宝藏》,为何又没有千字文帙号?怎样解释这一矛盾现象?

我认为,这一没有千字文帙号的《妙法莲华经》很可能是《开宝藏》开雕之初的试雕本。

一部大藏经卷帙浩繁,北宋《开宝藏》为显示皇家官版藏经的气魄,一改唐代标准的佛经版式,把



每纸28行17字改为每纸23行14字。这样,正式雕印之前先进行试雕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以《妙法莲华经》作为试雕对象,很可能因为此经影响巨大,流通量也大,一般认为雕印此经的功德巨大,所以被选中。

那么,为什么元代的《佛祖历代通载》会有开雕于开宝五年的说法呢?可以这样设想,开宝四年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雕印《开宝藏》,有关人员衔命从东京(今河南开封)赶往益州需要花费时日,到了益州筹备开雕事项也需要花费时日。试雕的《妙法莲华经》完成,大约已到开宝四年的下半年,甚至到了年末。这样,在开宝四年,《开宝藏》尚未来得及进行大规模雕版,而大规模的正式雕版从开宝五年才开始。这或许就是《佛祖历代通载》称《开宝藏》开雕于开宝五年的由来。

但上面所说只是推论,并无证据。即使将来有资料证明开宝四年仅为小规模试雕,开宝五年才大规模雕版,主张《开宝藏》开雕于开宝四年的观点依然是正确的。这是因为:第一,《佛祖统纪》为南宋的作品,而《佛祖历代通载》是元代的著作,按照一般的学术规范,应以前者所述为依据。第二,即使是试雕也罢,高平实物证明开宝四年《开宝藏》的确已经开雕,历史记载与现存实物可以相互印证。

长期以来,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赞同开宝四年说,有的赞同开宝五年说,也有的依违于两者之间,称雕于“四年或五年”。我认为,通过上述考证,可以把《开宝藏》的开雕年代确定在开宝四年(971)。

### 《开宝藏》开雕地点

对《开宝藏》的开雕地点,宋代《佛祖统纪》称在益州开雕,元代《佛祖历代通载》没有涉及。益州,即今四川成都。晚唐以来,四川刻版印书业较为兴盛,敦煌遗书中就有四川传入的刻本具注历日。此外,北宋初年,益州是北宋王朝的大藏经供应地。史书上多有敕令益州抄写金银字大藏经的记载。因此,北宋王朝安排在雕版印刷较为兴盛、大藏经抄写事业比较兴盛的益州雕印大藏经是可以信从的。

目前学术界对这部藏经开雕于益州,均无异议。

### 雕印《开宝藏》的主持人

按照上述《佛祖统纪》的记载,《开宝藏》乃由宋太祖赵匡胤下令,由内侍省宦官高品张从信主持雕印。张从信,除《佛祖统纪》外,史书无载。按《宋史》卷一六九,内侍省宦官从上到下,分为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内侍殿头、高品、高班、黄门、内侍班等七等,“高品”为其中第四等,为中级

宦官。以往曾有研究者把“高品”误为人名,以为宋太祖派遣高品与张从信两人赴蜀刻经,应予纠正。

宦官为皇帝近侍,经常接受皇帝的命令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雕印《开宝藏》即为其中之一。遗憾的是至今没有找到关于张从信身世、信仰的任何记录,也没有找到关于他主持雕印《开宝藏》的具体经过的记录。

按照惯例,像这样与佛教相关的大事,一般会有当时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参与。但历史数据没有留下相关的记载,甚为遗憾。敦煌藏经洞保存的遗书中有一件名为《左街相国寺精义大师赐紫沙门臣德神进〈开元释教大藏经目录〉》的文献。关于这件文献,将在下文讨论。当然,相国寺的这个精义大师德神是否参与了《开宝藏》雕印,如果真的参与,他的作用是什么?目前都无法证实。

### 《开宝藏》的目录依据

所谓“《开宝藏》的目录依据”,是指北宋王朝最初计划雕印《开宝藏》时,决定以什么藏经的目录为依据进行这一工程。敦煌遗书斯 5594 号可为我们提供这一问题的答案。

敦煌遗书斯 5594 号的标题为:“左街相国寺<sup>①</sup>精义大师赐紫沙门臣德神进《开元释教大藏经目录》”。从内容看,它所抄仅是《开元录·入藏录》,且与智昇的《开元录·入藏录》不同,加上了千字文帙号。这正是当时大藏经目录的标准形态。斯 5594 号

利傳告此丘彼天帝釋於諸三十三  
天為王為主以是因緣故彼天帝釋  
名因提利佛告比丘然彼釋提桓因  
平為人時受持七種受以是因緣得  
天帝釋何等為七釋提桓因本為人  
時供養父母乃至等行惠施是為七  
種受以是因緣為天帝釋今時世尊  
即說偈言如上應說佛說此經已諸  
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憍舍離國憍  
池側重閣講堂令時世尊告諸比丘  
奉衣鉢洗足已往詣佛所稽首禮足  
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等展轉者  
衣持鉢入王舍城乞食聞有外道出  
家名舍羅步住王舍城須摩竭陀池  
側於自象中作是唱言沙門釋子法  
我已忘知知彼法律已然後棄捨喜  
狀世尊可自往彼須摩竭陀池側憍  
慙彼故今時世尊默然而許於日曛  
時從憍覺往到須摩竭陀池側外道  
舍羅步所時舍羅步外道出家遇見  
門聚落舍羅門聚落乞食有非時雲起  
令時世尊作是念我今當往憍聚  
落聚落長者大會堂中作是念已即  
往向彼大會堂而時憍聚落長者悲  
集堂上遇見世尊共相謂言彼刹頭  
沙門竟知何法今時世尊告彼婆羅  
聚落婆羅門長者言諸婆羅門有知  
法者有不知者制利長者亦有知法  
者有不知法者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非男欲勝男王不伏難伏妻不勝夫  
無子不亦父無會無智者無智不法言  
貪念殺斷是則名智者  
憍勝至於憍定清淨見也其心增存  
柔順之定彼則見除所有貪煙塵志  
愚癡是故名曰無欲之定尚未得除  
自大憍勝至於憍定清淨見也其心  
念言吾我起滅從何所興思惟惟解  
其吾我者所因習味分別諸識皆從  
因緣而致此業從是因緣致有神識  
復自念言此諸因緣為有常乎為無  
常耶復自念言因緣所合致神識者  
此皆無常元有根本此神識者依持  
無常而有妄想故有緣起十二因也  
皆暗於蓋元常苦空毀壞別離欲滅  
盡曉了是者乃知無本得至降伏清  
一切起得入道行是乃速致除於自  
大無慢放逸禪定之業現清淨行是  
則名由聖法印清淨之業從始至終  
究竟奉末佛說如是諸比丘聞莫不  
歡喜作禮而去  
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支喜  
薩沙門姜法護於酒泉演此經第  
子生法首筆受今此深法普流十方  
大赤常光  
大宋開寶七年甲戌歲奉  
雕造  
左街相國寺精義大師賜紫沙門臣德神進



并非德神所进呈的《开元录·入藏录》的原稿,而是敦煌灵图寺的一个抄本,抄本文中有“图有”、“有”等标注,并有关于经帙形态的记载。由此可知这个“德神进呈目录”其后通过某种途径传到敦煌,被敦煌灵图寺用来作为点勘寺藏大藏经的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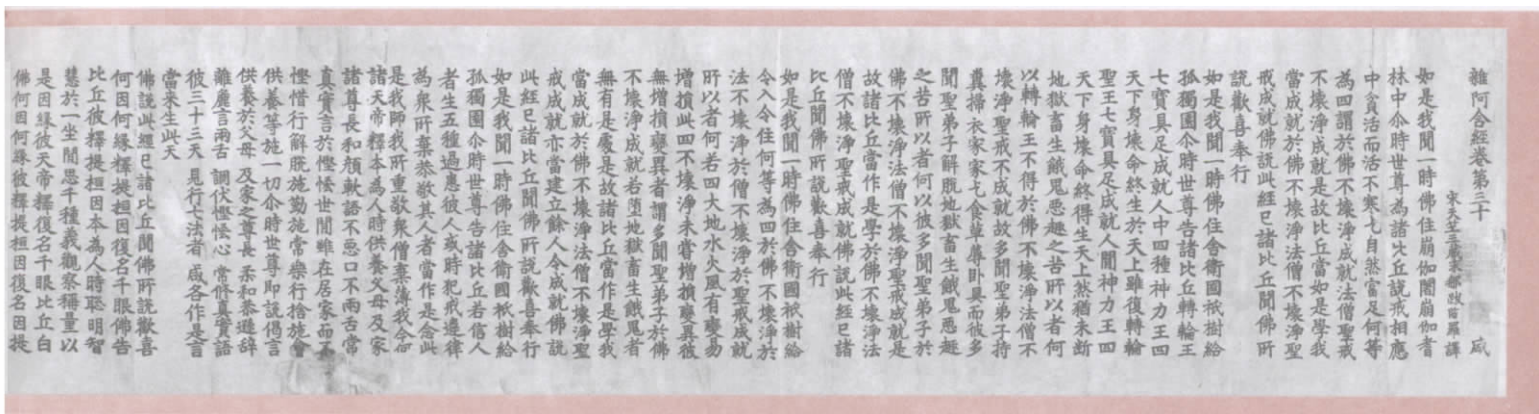
相国寺是东京(开封)古刹,原系唐睿宗时由建国寺改建。由于北宋建都东京,相国寺便成为北宋主要寺庙之一。查阅宋代的史料,皇家的很多佛教活动都与相国寺有关,由此可知相国寺与宫廷的密切关系。该斯 5594 号写于北宋初年,由于相国寺是京师东京右街的第一大寺,德神既蒙赐紫,又封为“精义大师”,可见应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僧人领袖。按当时惯例,僧人向皇帝进呈的经典,应是本人新翻译或新撰述的著作,以求得到嘉勉及御准入藏的殊荣。但德神所进却是经过改编,亦即加上千字文帙号的唐智昇《开元录·入藏录》,也是当时通行的标准大藏经目录,这完全不符合僧人进呈佛典的惯例。那么,德神为什么要进呈这样一部大藏经目录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有一个:当时北宋朝廷动议要雕印大藏经,德神为修造新的大藏经进呈目录,以为雕印的依据。由于当时的大藏经均按照《开元录·入藏录》组织,因此,德神进呈一部结构、帙号与《开元录·入藏录》完全相符的目录,完全合情合理。

## 《开宝藏》的底本依据

所谓“《开宝藏》的底本依据”,是指张从信等在益州正式雕印《开宝藏》时,实际以一部什么样的藏经作为底本。目录依据与底本依据相互联系,又互有区别。

德神在进呈这部目录的同时,是否也进呈一部与这一目录完全配套的的标准的大藏经经本,以用作雕印《开宝藏》的底本,史料失载。从斯 5594 号标题看,德神进呈的仅是目录。我推测,即使德神同时进呈了配套的经本,这部经本也没有运到益州去作为雕印的底本。益州距离东京山高水远,益州本身就有大藏经,朝廷曾经多次在益州抄写金银字大藏经颁赐各地,仅敦煌就得到过好几部。益州的大藏经也属于《开元录·入藏录》系统。因此,雕印《开宝藏》,它的底本完全可以在益州就地取材,不必从数千里外的东京带入。所以,我认为《开宝藏》乃根据益州所存的某一部写本藏经雕印而成。

《开宝藏》已经亡佚,无全藏留存,我们现在无法探讨其全貌。但幸运的是,北宋崇宁年间,东京法云禅寺住持惟白曾在婺州金华山智者禅寺阅读某一部藏经,“今于四百八十函,则函函标其部号;五千余卷,则卷卷分其品目。便启函开卷,即见其缘起耳。”<sup>[2]</sup>即逐帙、逐经、逐卷著录该藏大意,撰成《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八卷。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可知,这部藏经属于《开元录·入藏录》系统,共480帙,按照《千字文》从“天”到“英”字共排用帙号480个。在此,利用《开宝藏》所收全部12卷13种<sup>[3]</sup>《开宝藏》零本与《大藏经纲



目指要录》做一个对照。

表一：《开宝遗珍》所收经卷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对照表

《开宝遗珍》所收经卷	大藏经纲目指要录
秋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	秋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
李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一	李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一
文字号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十一	文字号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十一
有字号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	有字号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鸣字号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草字号 阿惟越致遮经卷上	草字号 阿惟越致遮经卷上
大字号 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	大字号 大云经
盛字号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	盛字号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
川字号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川字号 杂阿含经卷第三十九
圣法印经	若字号 圣法印经
令字号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令字号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存字号 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	存字号 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
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	无

上表显示,除了《妙法莲华经》卷七、《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圣法印经》、《御制秘藏诠》卷十三等四种外,现存其余九种《开宝藏》零本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的著录完全一致。下面我们讨论有问题的四种。

1、《妙法莲华经》卷七,《开宝藏》零本无千字文帙号。关于这一点,上文已经做了解释:《开宝藏》中的《妙法莲华经》很可能是早期试雕本,故无帙号。而在《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中,《妙法莲华经》的帙号作“鸣”。

2、《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开宝藏》零本千字文帙号作“大”。但《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大”字号帙著录为<sup>[4]</sup>:

大,十卷

《大方等大云经》六卷

《大云轮请雨经》二卷

《大云经》二卷

## 《方等经》二卷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惟白明明说该帙收入十卷,但实际著录却为十二卷。第二,“大”字帙中无《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们只要对照《开元录·入藏录》便可明白。下面是《开元录·入藏录》的相关著录:

《大方等大云经》六卷。(一名《大方等无相大云经》,一名《大云无相经》,一名《大云蜜藏经》。或四卷,或五卷)九十纸。

《大云请雨经》一卷。(内题云:《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二十三纸。

《大云轮请雨经》二卷。二十七纸。

《大方等大云请雨经》一卷。(内题云:《大方等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二十纸。

上四经十卷同帙。<sup>[5]</sup>

两相对照,可以明白:

第一,该帙实际只收 10 卷。《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中的“《大云经》二卷。《方等经》二卷”应为“《大云经》一卷。《方等经》一卷。”

第二,《开宝藏》零本《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即《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中的《大云经》。

3、国家图书馆所藏《杂阿含经》卷第三十卷端虽有首题,但卷中由《杂阿含经》卷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四等诸卷的残纸缀合,文字错乱严重,多不相接。最后两纸所缀接为《圣法印经》残卷卷尾。该卷尾保存《圣法印经》末尾的经文、题记,但无尾题及千字文帙号。两纸接缝处的版片号也被剪掉,无法辨认。因此无比较价值。在《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中,《杂阿含经》卷三十、三十五、四十、四十四等诸卷的帙号应为“盛”、“川”、“流”,《圣法印经》的帙号为“若”。

4、《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没有著录《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这是为什么呢?惟白在逐一著录 480

帙之后,写了这么一段话:

通前计大小乘经律论,总五千四十余卷、四百八十帙,以《开元释教录》为准,则今撮略目目所集也。其余随藏添赐经传三十帙、未入藏经二十七帙,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无,印经官印板却足。故未录略在,知者可鉴耳。<sup>[6]</sup>

也就是说,惟白阅藏时,仅著录《开元录·入藏录》部分,对其余的佛典,一概未予著录,所以没有《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其实,在益州雕印《开宝藏》时,只雕印了《开元录·入藏录》部分。至于《御制秘藏诠》等后续经典,都是后来在东京续雕并且逐渐流传的。其后此卷在《开宝藏》中编为“嶽”字号。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确认惟白的《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的确依据《开宝藏》编纂而成,并顺便解决了《开宝遗珍》中两个原本没有帙号的经典应有的帙号,改正了《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中的二个错误。

上文惟白称“其余随藏添赐经传三十帙、未入藏经二十七帙,天下寺院藏中,或有或无”,说明当时各地寺院收藏的《开宝藏》,有的包括续雕,有的没有包括续雕。那些没有包括续雕的,都属于《开宝藏》刚运到东京时的早期印本。而那些包括续雕的《开宝藏》,或为后期印本,或为早期印本而增补了其后的续雕部分。惟白在婺州金华山智者禅寺所读的这部藏经不包括续雕部分,应该属于《开宝藏》早期印本。

## 《开宝藏》底本的来源

上文谈到,我认为《开宝藏》乃根据益州所存的某一部写本藏经雕印而成。确认了《大藏经纲目指要录》依据《开宝藏》撰成,本身反映了《开宝藏》实际构成,我们可以先将“德神进呈目录”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做一个对照,由此进一步探讨《开宝藏》所依据的底本的来源问题。

在此将“德神进呈目录”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的相关部分对照如下:

表二:“德神进呈目录”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比较表

《开宝遗珍》所收经卷	大藏经纲目指要录	《开元录·入藏录》
秋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	秋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	秋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
李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一	李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一	李字号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八十一
文字号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十一	文字号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十一	乃字号 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十一
有字号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	有字号 大方等大集经卷第四十三	虞字号 大方等大集日藏经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鸣字号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在字号 妙法莲华经卷第七
草字号 阿惟越致遮经卷上	草字号 阿惟越致遮经卷上	赖字号 阿惟越致遮经卷上
大字号 大云经请雨品第六十四	大字号 大云经	常字号 大云轮请雨经
盛字号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	盛字号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	流字号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
川字号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九	川字号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九	不字号 杂阿舍经卷第三十九
圣法印经	若字号 圣法印经	言字号 圣法印经
令字号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令字号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业字号 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
存字号 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	存字号 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	甘字号 十诵尼律卷第四十六
御制秘藏诠卷第十三		

从表二可知,虽然两者都属《开元录·入藏录》系统,经典的排序完全一致,但仅就表列的9部经典而言,就有5部经典的分卷互有不同。并且由于分卷的不同,造成两者分帙的不同;或分帙虽然不变,但因前面帙号变化的影响,造成后面帙号的错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如拙作《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所指出:“会昌



废佛之后,一方面,全国藏经逐步统一到《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上来;另一方面,各地佛教发展的情况不同、传统不同(比如是注重义理性佛教,还是注重信仰性佛教等)、对藏经的需求角度不同、加上写本本身的流变性,使得各地的藏经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开元释教录·入藏录》也因此衍化出各种变种,彼此呈现若干差异。但此时的分化与差异,与会昌废佛以前佛教大藏经的百花齐放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建筑在《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基础上的分化。”<sup>[7]</sup>此处所谓“建筑在《开元释教录·入藏录》基础上的分化”,指的是虽然各地写本藏经的目录基础均为《开元录·入藏录》,但实际所收的经典,从内容讲,可能出现异本,或可能出现内容的错乱;从卷次讲,可能出现异卷<sup>[8]</sup>;此外还会出现无序跋的区别;可能加收少量其它经典等等。所以,虽然均属《开元录·入藏录》系统,也会互相出现种种差异,从而出现写本大藏经统一中的分化现象。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开元释教录略出》<sup>[9]</sup>、《可洪音义》<sup>[10]</sup>,也可以参见敦煌遗书资料。<sup>[11]</sup>

表二证明,虽然德神进呈了一部开元大藏经的目录,但并没有进呈与这一目录配套的经本作为雕印《开宝藏》的底本。或即使进呈过这样一部底本,也没有运到益州,没有实际使用。因此,《开宝藏》所使用的底本,无疑是益州当地的某一部写本藏经。

### 《开宝藏》底本与《开元录·入藏录》的区别

那么,根据益州的那部写本藏经刻成的《开宝藏》与正统的《开元录·入藏录》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我们可以在表一加上《开元录·入藏录》<sup>[12]</sup>,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开宝藏》底本与《开元录·入藏录》的区别。

从表三可知,除了最初的《大般若经》外,表中《开宝藏》诸经的千字文帙号与《开元录·入藏录》

表三:《开宝遗珍》所收经卷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开元录·入藏录》复原拟目”对照表

德神进呈目录	大藏经纲目指要录
天~柰 大般若波经1部600卷	天~柰 大般若波经1部600卷
菜、重、芥 放光般若经1部30卷	菜、重 放光般若经1部20卷
姜、海、咸、河 摩诃般若经1部40卷	芥、姜、海 摩诃般若经1部27卷
淡、鳞 光赞般若经1部15卷 摩诃般若钞经1部5卷	咸、河 光赞般若经1部10卷 摩诃般若钞经1部5卷
潜 道行般若经1部10卷	淡 道行般若经1部10卷
羽 小品般若经1部10卷	鳞 小品般若经1部10卷
翔 大明度无极经1部4卷 胜天王般若经1部7卷	潜 大明度无极经1部6卷 胜天王般若经1部7卷

均不相同。特别严重的是,《开元录·入藏录》所收《大集经》为三十卷本,而《开宝藏》所收《大集经》为六十卷本。其实,在《大唐开元释教录》中,智昇曾经专门论述这一问题,指出三十卷本《大集经》为正,六十卷本《大集经》为误。但《开宝藏》所收依然为六十卷本。这说明《开宝藏》所依据的那部写本藏经与《开元录·入藏录》有相当大的差别。

如《开宝藏》之前撰成的五代《可洪音义》、《开宝藏》之后编纂的辽藏所示,其实当时的人们是了解虽然同为佛教大藏经,其收经情况相互有别,需要进行整理。但《开宝藏》的主持人员在从事《开宝藏》雕印之前显然并未进行基础的文献整理工作。此次收入《开宝遗珍》的《大宝积经》卷第一百十一,第二十八纸为偈颂,其中有一段应为:

众生虽垢重 诸佛不厌舍  
愿以大慈悲 度脱生死海<sup>[13]</sup>

但《开宝遗珍》所收本却为:

众生虽垢重 诸佛不厌舍  
愿以大慈悲 诸藏皆少一句

说明当时《开宝藏》所依据的底本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诸藏皆少一句”这一注释来看,雕印

者发现这里有问题,并企图解决,但最终也未能解决,只好存疑。有意思的是,日本《圣语藏》本《大宝积经》卷一百一十一的相应部分为:

众生虽垢重 诸佛不厌舍  
愿以大慈悲 哀愍常摄护<sup>[14]</sup>

说明当时不少写本藏经均脱漏此句,有的就自行添补,于是产生《圣语藏》本系统。

总之,从《可洪音义》所体现的汉中藏经的情况、从敦煌遗书所体现的敦煌情况判断,同一地区的大藏经会有种种不同形态。由于资料缺乏,我们现在无法对益州地区的大藏经作全面的评价。但依据上述讨论,我们可以肯定被张从信用来作为《开宝藏》底本的这部写本大藏经并不符合《开元录·入藏录》的标准形态,与“德神进呈目录”也有很大的差距。从现存《开宝藏》经本及高丽《守其别录》等资料看,主持《开宝藏》雕印的人员对佛教大藏经的认知水平有限,也没有下功夫对用作雕印底本的写本藏经进行认真的校勘。这种情况在官版大藏经中是比较常见的,清《龙藏》就是显著的例子。

需要指出的是,《开宝藏》的这些错误,在其后被发现并逐渐得到改正,关于这一点,拟另外撰文论述。

### 《开宝藏》的版式

就刻本大藏经而言,所谓版式,指版片的大小、行款、界栏、版片号等具体内容及由此体现的装帧形态。

汉文大藏经的版式是在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演化的。

在写本时期的大藏经形成阶段,由于雕版印刷技术还没有产生,自然无所谓“版式”。那时的写经,其行款应纸张的不同而不同,没有一定的规范。但最迟到南北朝,开始出现每行<sup>[15]</sup>17字这一规范。而此时每纸抄写多少行,虽然应纸张大小依然

不同,但已经出现趋同的态势。隋唐以来,不但每行17字这一规范被继承并逐渐强化,每纸的行数也开始规范。特别是唐代写经,规范为每纸28行,每行17字。正因为如此,唐代规定的试经制度,便具体要求僧人必须能够背诵多少张纸的经典。如《唐文拾遗》卷三引《唐会要》卷四九,载玄宗《试天下僧尼诵经敕》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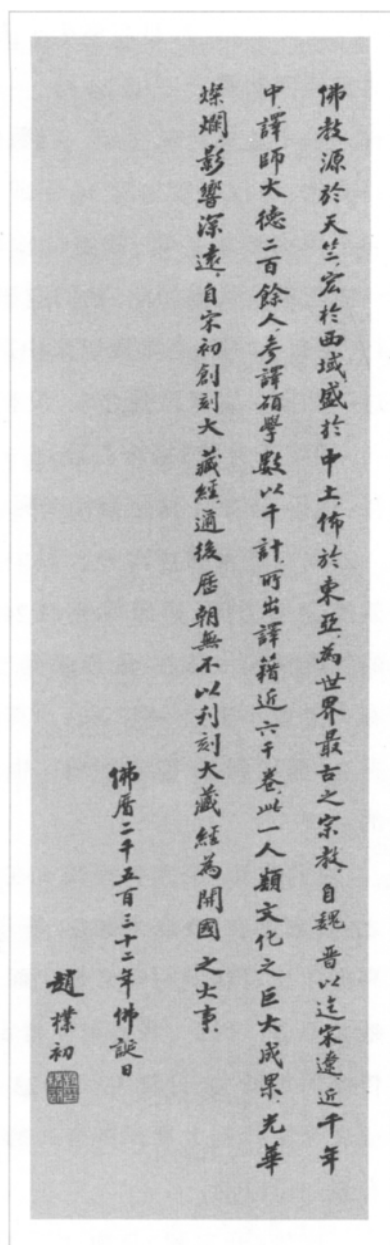
有司试天下僧尼,年六十已下者,限诵二百纸经,

每一年限诵七十三纸,三年一试。落者还俗,不得以坐禅、对策义试。诸寺三纲,统宜入大寺院。<sup>[16]</sup>

《册府元龟》卷五二载敬宗宝历元年:

仍令两街功德使各选择有戒行僧,谓之大德者。考试僧能暗记经一百五十纸,尼能暗记经一百纸,即令与度。<sup>[17]</sup>

如上所述,唐代写经行款,一纸28行,行17字。200纸将近10万字,150纸也有7万多字,数量不算小。这也是唐代政府整顿僧尼,提高僧尼素质的措施之一。





当然,写经都是写经生个人劳动的结果,规范的写经固然符合一纸 28 行,一行 17 字的要求;也有大量不甚规范的写经,行数依然依照纸张大小而变化,每行字数也有 16 字或 18 字之类的变化。甚至因为纸幅甚宽,故每行抄写 30 多字的,不可一概而论。虽则如此,我们应该明确指出,一纸 28 行,一行 17 字,是盛唐以来中国佛教写经的规范。这一规范一直保持到北宋,没有改变。

但《开宝藏》完全打破这一规范,改为每纸 23 行,每行 14 字。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考察盛唐写经,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为例,盛唐写经约 2400 余号,其每张纸的长度情况大体在 46 厘米到 50 厘米之间,个别有大于或小于这一数字的;其每张纸的高度大体在 24 厘米到 27 厘米之间,也有不符合这一数字的。<sup>[18]</sup>

《开宝藏》纸张长度基本在 47 厘米到 48 厘米之间,高度在 30 厘米到 33 厘米之间。也就是说,高度要比唐代的写经纸高,而长度则与唐代写经纸差不多。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开宝藏》将传统的每纸 28 行改为每纸 23 行,并非纸张太小,或者无法找到大批长度合适的版本等原因,而是有意加以改动。

比较《开宝藏》与唐代写经,《开宝藏》全藏行款疏朗,气魄宏大,充分体现了北宋初年文治的兴盛,佛教的发达,以及汉文化的博大胸怀与气概。我们认为,这就是当年主持人改动佛藏传统行款所要达到的目的。

开宝藏没有界栏,这是《开宝藏》与依照它覆刻的《初刻高丽藏》、《金藏》的重要区别。界栏便于将所刻内容框限在一定的区域内,使得排列整齐。《开宝藏》没有界栏,但依然排列整齐,说明当时益州的版刻技术达到很高的水平。这应该也是宋王朝决定在益州刊刻这部旷世大藏的原因之一。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开宝藏》首创了大藏经的版片号。

版片号指刊刻在版片上的标明该版所刻经典、版片次序的文字。

写经由于单独抄写,然后依卷逐纸缀接装潢,所以不用标注序号。刻经的版片需要反复使用,一次往往刷印多部,所以都要在版片上刊刻版片号,以便版片的管理、刷印后印张的缀接。比如前几年面世的晚唐刻经《三

十三分金刚经》,上面就有版片号,注明某版为该经中的第几版。至于大藏经,由于数量巨大,如《开宝藏》早期刻经五千余卷,版片多达十三万块,是当时中国,也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木刻大丛书。这么多的版片,如果没有一定的编号,就会陷入混乱,无法予以管理。所以《开宝藏》主持者首创了版片号。《开宝藏》的版片号包括经名卷次、版片序号、千字文帙号等。标注在每版的右端。具体形式如下:

大宝积经第一百一十一卷 第十五张  
文字号



有了这样的版片号,每一块经版都有了自己的身份证,确定了它在整部大藏经中的具体位置。这样,既便于平时的管理,包括上架、清点、配补等,也便于对刷印出来的大批印张进行缀接、装潢。虽然《开宝藏》的版片号是主持者在中国早期刻经版片号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但我们依然要充分肯定他们的这一功绩。

此后历朝历代的刻本大藏经,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对版片号有所变革,有所简化,但均保留用版片号管理藏经版片的办法。

虽然经折装早在盛唐已经出现,且部分佛经已经采用经折装。但直到宋代初年,还没有哪部大藏经整体采用经折装。因此,《开宝藏》采用传统的卷轴装,包括其后不久的《辽大字藏》同样采用卷轴装。《开宝藏》的这种装帧形式影响到《开宝藏》系统的《初刻高丽藏》、《再刻高丽藏》与《金藏》。后代有将卷轴装《开宝藏》改作经折装者,损害了原经典的原装帧形式,甚不可取。

应该指出,上世纪初,由于《开宝藏》传本甚为罕见,一般人难以识其庐山真面目,因此对它的版式也有一些错误的传闻,比如称它为“每半叶五行,每版共二十五行”。现应予纠正。

上面对有关《开宝藏》刊刻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至于《开宝藏》版片运到开封以后的情况,拟另行研究。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 附录:《开宝遗珍》目录

1、《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〇六,秋字号,山西博物院收藏。

2、《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五八一,李字号,中国佛教协会图文馆收藏。

3、《大宝积经》卷一一一,文字号,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4、《大方等大集经》卷四三,有字号,上海图书馆收藏。

5、《妙法莲华经》卷七,无千字文号,高平市文博馆收藏。

6、《阿惟越致遮经》卷上,草字号,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7、《大云经请雨品》六四,大字号,高平市文博馆收藏。

8、《杂阿含经》卷三五、四四、佛说圣法印经缀卷,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9、《杂阿含经》卷二一、三〇、四四缀卷,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10、《佛本行集经》卷一九,令字号,日本京都南禅寺收藏。

11、《十诵尼律》卷四六,存字号,日本书道博物馆收藏。

12、《御制秘藏诠》卷一三,无千字文号,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收藏。

#### 【注 释】

[1] 相国寺属于东京右街,斯 5594 号误写作“左街”。

[2] 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载《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第 771 页。

[3]《开宝遗珍》之《杂阿含经》卷第三十末尾接粘《佛说圣法印经》两纸,故虽为一卷,却有两种经典。

[4] 参见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四,载《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第 646-647 页。

[5]《大正藏》,第 55 卷第 683 页中栏。

[6] 惟白:《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八,载《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二卷,第 768 页。

[7] 方广钊:《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24 页。

[8] 所谓“异卷”,指同一部经典,内容完全相同,而分卷不一样。产生异卷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所用纸张的差异。由于所用纸张不同,抄写同一部经所需纸张的多少会有不同。不同纸数抄成的经典,卷起来以后大小不同。

如若每卷太大,则使用阅读不便。这时往往会重新分卷,于是出现异卷。如据《大唐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卷七记载,抄写《大般泥洹经》,用蒲州纸需要 144 张,而用供城纸则需要 163 张。《大唐开元释教录广品历章》卷七记载,《大般泥洹经》有六卷、十卷两种卷本,大约便与所用纸张多少有关。

[9] 参见方广钊:《〈开元录略出〉非智昇所撰》,载《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第 408 页。

[10] 五代后晋沙门可洪在汉中所撰《音义》时,参考了附近寺院所存的多部藏经。这些寺院相距虽然不远,所存的藏经也均属于《开元录·入藏录》系统,但相互略有差异。包括异本、异卷等等。

[11] 敦煌遗书中所存敦煌各寺院藏经目录,有些佛典的千字文帙号互有差异,说明它们所属佛典的结构互有参差。参见方广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上、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年 8 月。

[12] 所用《开元录·入藏录》为我所复原的拟目,参见《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12 月。

[13] 《大正藏》,第 11 卷,第 630 页中栏。

[14] 《大正藏》,第 11 卷,第 630 页校记。

[15] 统计每行字数时所谓的“行”指“标准行”。所谓“标准行”,指一个顶天立地、抄写完整的行。此时排除偈颂、咒语、题记以及有敬空等特殊抄写形式的行。

[16] 《唐文拾遗》卷三,中华书局影印本《全唐文》第十一册,第 10396 页上。

[17] 《册府元龟》卷五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 580 页。

[18] 以纸张高度为例,2400 余号的高度数据如下:

高度	数量
23 厘米以下	19 号
23 厘米到 24 厘米	49 号
24 厘米到 25 厘米	486 号
25 厘米到 26 厘米	1588 号
26 厘米到 27 厘米	796 条
27 厘米到 28 厘米	130 号
28 厘米以上	28 条

## 《福建历代高僧评传》第一批成果丛书首发式在泰宁举行

本刊讯 2010 年 11 月 13 日,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重点科研项目《福建历代高僧评传》第一批成果丛书首发式在泰宁举行,来自海内外的高僧大德、各界嘉宾一百多人出席首发式。

在闽参加泰宁庆云寺慈航菩萨纪念堂奠基仪式的明哲长老、净良长老、心培法师、寂晃长老等对编撰《福建历代高僧评传》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心培法师说:“台湾佛教界非常乐见《福建历代高僧评传》的出版,这对两岸佛教界的进一步深入交流是非常有意义的。”并对福州开元寺近年来开展的佛教文化事业表示赞叹。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台湾中国佛教会原理事长净良长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澳门佛教总会会长健钊长老等高僧还应邀为丛书作序,他们对出版发行《福建历代高僧评传》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学诚法师说:“编撰《福建历代高僧评传》丛书,此举不仅是福建佛教界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界的盛事。”净良长老说:“但愿此书之面世,能成为各地教徒的明灯,普照大乘佛教于世界。”觉光长老说:“期待这新编佛教史籍会是‘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健钊长老在其序言中称赞本性法师“游历各邦,学养深厚,慈风法雨,著作良多,恩泽众生,年青有为,今荷担如来家业,是为翘首以瞻之”。

《福建历代高僧评传》丛书精选 50 位与福建有殊胜因缘的高僧,计划为每一位高僧立传,每本评传 10-20 万字。第一批丛书三本《隐元隆琦禅师》、《法眼云益禅师》和《为霖道霈禅师》已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开元佛教文化研究所)